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建构

刘子惠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5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5年5月31日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历史建构及其深远影响。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理念, 包括理念论、正义观、认识论和政治哲学。第二部分从历史维度考察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其从古希腊哲学的起始, 经历中世纪与基督教神学的融合, 到近代哲学中理性的重视。第三部分总结了柏拉图主义对哲学问题的贡献和拓展, 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并激发了后来西方哲学家对知识、真理和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通过对柏拉图主义的深入分析, 为理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柏拉图主义的历史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洞见。

关键词

柏拉图主义, 西方哲学史, 历史建构, 理念论

Platonism and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Zihui Li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pr. 29th, 2025; accepted: May 21st, 2025; published: May 31st, 2025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profound impact of Platonism on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comprise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outlines Platonism's fundamental concepts,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ideas, justice,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its influenc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with medieval Christianity, to the emphasis on rational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The third part summarizes Platonism's contributions and extensions to philosophical issu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nspiring later Western philosophers to delve deeply into knowledge, truth, and existence. The fourth part concludes the article, providing crucial perspectives

文章引用: 刘子惠.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建构[J]. 哲学进展, 2025, 14(5): 472-478.

DOI: 10.12677/acpp.2025.145271

and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core issu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Platonism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latonism.

Keywords

Platonism,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Theory of Idea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以理性探求真理的思想史诗，其中柏拉图主义以其理念论、正义观和辩证法构成了贯穿两千年的核心脉络。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柏拉图主义在古希腊本体论建构、中世纪神学融合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显性影响，而现当代哲学则呈现出多维度的理论重构与批判性对话。在近年现当代哲学领域，柏拉图主义的理论重构与批判性对话呈现出多维度突破，尤其在数学哲学、政治伦理学及现象学诠释等方向涌现出权威性研究，深刻激活了理念论的当代生命力。

在数学哲学领域，Ferreirós (2022)通过区分“内部柏拉图主义”与“外部柏拉图主义”，重新厘定了数学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前者将数学对象视为思维建构的“内在现实”，后者则主张其独立于认知的“超越性存在”；研究指出，当代数学实践更倾向于接受选择公理等理想化存在的内部柏拉图主义路径，而非诉诸抽象实体的形而上学承诺[1]。Ternullo (2023)进一步提出“高阶柏拉图主义”模型，结合哈金斯 (Hamkins)的多元宇宙理论，探讨数学对象在不同逻辑框架下的层级化存在方式，为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假设争议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2]。Panza (2023)则主张从数学实践的历史性出发，认为柏拉图主义无须依赖抽象论证，而是通过几何证明与代数运算等具体操作自然显现其本体论承诺，从而将数学哲学推向“高级实证科学”的范畴[3]。

在政治伦理学领域，柏拉图正义观的现代性转化成为研究焦点。Xue (2023)系统分析了《理想国》中“各司其职”原则与当代政治思潮的关联，指出保守主义从柏拉图思想中汲取传统价值稳定性的资源，而自由主义则批判其等级秩序对个体权利的压制，这种张力凸显了正义理论在多元社会中的解释困境[4]。现象学对理念论的重构则开辟了本体论诠释的新维度：Trizio (2020)阐发胡塞尔对《蒂迈欧篇》的解读，认为柏拉图的目的论世界观可通过现象学还原转化为“世界的 teleological 科学”，其中数学结构既是理念的显现，也是理解世界意义的关键[5]。

科学哲学领域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性对话同样值得关注。Fjelland (2023)批判了现代物理学中“万物理论”的极端柏拉图主义倾向，指出伽利略实验方法论中的理想化假设与技术实践密不可分，这种“工具化理念论”既推动科学进步，也潜藏着脱离经验验证的风险[6]。Viola (2020)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提出“超越柏拉图式大脑”模型，反对将神经机制简化为统一抽象结构，强调个体认知差异对理念论认识论前提的解构作用，揭示了身心关系研究中的复杂性[7]。

柏拉图主义通过与现代性问题的深度交互，已从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转化为激发知识论、伦理实践与存在论诠释的创造性源泉，其历史价值在跨学科对话中持续焕发新的理论活力。

2. 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理念

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流派，其思想体系深远且多维，基本理念涵盖了理念论、正义观、

认识论、政治哲学等多个方面。它强调理念世界的真实性和超越性，主张通过理性认识理念世界以获得真正的知识。在政治哲学上，柏拉图主义追求正义的城邦和哲人王的统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柏拉图主义也关注艺术和美学问题，认为艺术能够激发人的思考和情感，对于培养人的灵魂和德性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基本理念共同构成了柏拉图主义独特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理念论

柏拉图在其哲学体系中构建了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理念世界，这些理念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拥有永恒、恒定且完美的本质。理念被视为万物的本质和基础，而个别事物则是理念的显现或模仿。柏拉图通过明晰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界限，明确了感性与理性认识的差异，凸显了理念世界的纯粹性和超越性。“作为多个的东西，是看见的对象，不是思想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不是看见的对象。”([8]: p. 267)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理念与现象世界的本质区别。具体来说，可知世界，即理念世界，具有永恒、普遍、绝对、必然以及完美的特性；而可见世界则是由变化多端、偶然且相对不完美的个别事物所组成。理念作为个别事物的根源和动力，同时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个别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理念的反映，它们的存在或是理念的直接表现，或是对理念的模仿。柏拉图的理念论经历了从前期到后期的演变：初期，他受到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的影响，强调了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分有”关系。然而，在后期，柏拉图对前期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指出理念与事物的分离可能导致无法调和的矛盾。他通过“通种论”探讨了各种范畴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存在”与“非存在”、“同”与“异”、“动”与“静”这三对范畴，试图解决感官世界与理念世界的统一问题。

2.2. 正义观

柏拉图主义正义观的出发点与基础是理念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8]: pp. 262-263)正义在柏拉图眼中是一种高度的和谐状态，这一观点在《理想国》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他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类比，揭示了正义的本质在于各个部分或阶层按照其本性和功能，有序地履行职责，从而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平衡。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秩序上，更深入地反映了内在要素与功能的完美匹配。他进一步将正义细分为国家与个人两个层面，并坚信，正义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中，更体现在国家的运作之中，即个人与国家均应遵循其内在的本质和理念。在国家层面，正义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三大品质在各阶层中的恰当体现；而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理性、激情与欲望的和谐统一。这种分类不仅体现了柏拉图对正义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他对个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面关注。

2.3. 认识论

柏拉图的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关于理念的知识，而非关于感官世界的知识。通过“回忆”或“灵魂转向”的过程，人们能够超越感官世界的表面现象，理解到理念世界的真实本质。这一观点强调了理念在知识获取中的重要性，从而巩固了理念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柏拉图认为：“知识的获取并非仅通过感官的感知，而是通过对感知的思考和理解。显然，通过思考我们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和真理，而仅凭感官则不能。”[9]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感性认识受限于感官世界的范围，其认知层次较为初级，通常只能提供相对和主观的感知，即所谓的“表象”。要深入理解理念世界的核心和追求真理的本质，即理念的探求，需要依赖于更为深刻和准确的理性认识。认识论的核心思想围绕着“理念”和“回忆说”展开。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来源于对理念的理解，而非仅仅依赖于感官世界的观察。他通过“线段喻”、“四线段”、“日喻”和“洞穴喻”等比喻，详细阐述了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些比喻将认知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从最低级的感官印象到最高级的理性知识，展示了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的逐步深化过程。

2.4. 政治哲学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在其《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一个基于理念论和正义观的国家构想。他明确指出：“国家的构建旨在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非特定阶级的单独利益。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期望在理想的城邦中找寻正义，而在最糟糕的城邦中则可能滋生不正义。”^[9]柏拉图坚信，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理念的完美体现，只有在这样的国度中，正义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实践。他的政治哲学体系深深植根于对正义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之中。柏拉图在《理想国》构建了一个以“贤人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模型，这一模型以理念论为基础，以正义为引领，追求智慧、勇气和节制的和谐统一，以至善为最终归宿。他强调，国家正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与职责履行，这种正义不仅涵盖了个体层面，还拓展至政治、社会乃至国家层面，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正义观念体系。他的政治哲学尤为重视哲学与政治的融合，他提出了“哲学王”的理念，主张哲学家应担任国家领导者，通过理性的智慧和知识引领国家的发展，实现国家的最优治理。这一观点深刻体现了柏拉图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哲学与政治虽各有其特性，但通过哲学王的理想，可以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所以，理念论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石，为正义观、认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正义观体现了个人和国家遵循其内在理念的重要性，是理念论在伦理和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认识论强调了对理念世界的追求和把握，是理念论在知识论领域的延伸。政治哲学则是对理念论和正义观的具体实践和应用，展现了柏拉图哲学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这四个观点共同构成了柏拉图主义的有机整体。

3.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的纵向历史建构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的纵向历史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开始，柏拉图主义就奠定了西方哲学中关于理念、逻辑、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的基础。中世纪哲学时期，柏拉图的理念论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宇宙和存在的解释框架，推动了中世纪哲学向更加哲学化的方向发展。近代哲学阶段，柏拉图主义通过笛卡尔等哲学家得以继承和发展，强调了理性的独立地位作为真理的来源。进入现当代哲学，虽然流派众多，但柏拉图主义仍以其独特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和对“理念”的探讨，影响着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思考。总之，柏拉图主义贯穿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为后世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哲学洞见。

3.1. 古希腊哲学

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 6 世纪，结束于公元 5 世纪，是西方哲学史的起点。古希腊哲学在东方、埃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从神话传说中首先关注物理世界的现象。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逻辑、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提出的理想国家摒弃了传统城邦的政治观念，也否定了自由公民的身份和每个人参与政府、分享权力的想法。与此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贯穿着更为成熟的“轮番为治”的民主思想，其理论来源实际上是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对民主的认可与选择。此外，在逻辑思想方面，柏拉图主义对语言和思维进行研究，以及提出了“分音符”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在继承这些观点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革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段论式辩证法。

3.2. 中世纪哲学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天主教会支配着世俗权力与精神生活，哲学成为解释信仰的工具，科学也受制于宗教。此阶段主要受基督教影响，从公元 5 世纪绵延至 15 世纪，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着重于圣

经及教会教义的阐释应用，核心问题聚焦于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

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对中世纪哲学影响深远。在基督教神学构建方面，奥古斯丁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是完满、不变、永恒且全善的，而感性世界与之相反。他主张上帝从虚空中创造世界，这一观点既结合了《圣经》的“创世纪”，也与柏拉图上帝运用已有资料创造世界的观点不同。奥古斯丁通过这种融合，让神学思考更为系统且具哲学深度。

在经院哲学发展进程中，阿奎那虽受亚里士多德哲学启发，但柏拉图理念论的痕迹同样显著。例如在探讨共相问题时，理念论中关于普遍与特殊关系的思考，为经院哲学的相关争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在形而上学领域，理念论对超验世界的设定，影响了经院哲学家对上帝本质、存在等问题的思辨；在认识论上，理念论中知识源于对理念的回忆等观点，也促使经院哲学家思考人类如何获取关于上帝及真理的知识。这些都表明柏拉图的理念论为经院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力推动了中世纪哲学向复杂、深刻方向的发展。

3.3. 近代哲学

这一时期从 15 世纪开始，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兴起，哲学开始关注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对个体主义、怀疑论和机械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笛卡尔将真理知识的体系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之上，这一点体现了他对柏拉图理念论的继承和发展。笛卡尔强调理性的独立地位，将其视为真理的来源，这与柏拉图强调理念作为真理的基础有着内在的联系，但笛卡尔的观点更加符合近代理性的需求。

近代哲学的初期是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阶段，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期。人们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自然和人成了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17 至 18 世纪末，近代哲学进入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逐渐摆脱神学束缚，走向繁荣。哲学上，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并非由神灵统治，而是由因果必然性所支配。自 18 世纪末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历史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成就共同推动了西方近代哲学达到其巅峰。

3.4. 现当代哲学

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哲学步入了现当代哲学的发展阶段。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其中，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探讨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内在标准”，这与柏拉图理念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相呼应。

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众多，主要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将科学视为研究对象，涵盖了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等；而人文主义则聚焦于人的问题，包含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等。其中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提出，受到柏拉图主义的深刻影响。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主义所代表的、以“理念”为核心的传统哲学体系，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将世界视作被分析和计算的客体，而非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和理解。“在场者毋须成为对象，对象毋需被经验为客体。”^[10]基于对柏拉图主义的思考，他认为，形成的人与世界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是对古希腊时期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的遗忘。

4.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柏拉图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之一，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强调理念世界的存在，将哲学思考从物质世界提升到精神层面，为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等流派奠定了基础。柏拉

图主义提倡理性追求和道德完善，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对人性、道德、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同时，其哲学方法和逻辑思维也为西方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思维方式。总之，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1. 柏拉图主义作为哲学传统的基石

柏拉图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正义观、认识论和政治哲学，为西方哲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理念论、灵魂理论、辩证法、道德教化以及哲学表达方式等多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理论与方法的结合，塑造了西方哲学的基本架构，确立了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地位。

柏拉图主义不仅在本体论层面为理性存在提供了框架，更在逻辑学和目的论层面提供了统一的支撑，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轴心的哲学系统。如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柏拉图系统地提出了众多概念范畴，诸如整体与局部、有限与无限的界限、静止与运动的状态等。这些范畴的阐述为后续的哲学体系，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也汲取了理念论中关于范畴转化和演变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辨哲学理念体系。因此，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无疑为思辨形而上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哲学的发展。

4.2. 柏拉图主义对哲学问题的深化与拓展

柏拉图主义对认识、知识、真理等问题的探讨，为后来的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哲学家提供丰富的思考素材，激发了他们对不同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4.2.1. 奥古斯丁的“光照说”

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并在其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构建中，积极吸收、转化和融合柏拉图的核心理论，实现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相结合。在柏拉图哲学中，关于理念认知的“回忆说”被奥古斯丁进行改造和转换，最终提出了独特的“光照说”，作为对柏拉图“回忆说”的对应概念：“神圣的光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的地位，相当于回忆在柏拉图哲学中的地位。”^[11]奥古斯丁的“光照”概念并非全新创造，而是源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洞穴比喻”。这一比喻原本意在强调光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象征着一种向真理接近的必需力量。在柏拉图的理论中，这种真理被理解为“善”，即最高的理念。奥古斯丁借用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光照视为认知真理、接近最高理念的重要路径。

4.2.2. 笛卡尔的怀疑论

笛卡尔的怀疑论通过理性主义与心物二元论，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提供了现代性转化，使其从超验形而上学转向科学认识论。这一重构的核心在于将理念的验证锚定于主体理性，并通过数学化赋予其可操作性。

根据《斐多篇》，柏拉图认为理念是超越感官的永恒实体，知识的本质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笛卡尔则通过普遍怀疑否定感官经验，转而以“我思”为基点确立真理。两者均以理性为知识根基，但笛卡尔将超验理念转化为主体反思的对象。例如，数学真理在笛卡尔体系中既是纯粹理智的产物，又可通过“清晰明确”的直观验证。这种转向使理念的普遍性基于理性自明性，而非神秘主义。胡塞尔指出，笛卡尔的“我思”开启了现象学还原的可能，即通过悬置经验假设，专注于意识结构分析，这延续了柏拉图对可知世界的追求，却将其转化为主体的先验分析。

心物二元论进一步重构了理念的本体论地位。柏拉图强调理念独立于现象世界，而笛卡尔将物质定义为几何化的广延实体。解析几何的创立是这一重构的典范：圆的理念通过方程成为可计算的数学对象。这种数学化使理念成为科学实践的工具，呼应伽利略“自然之书以数学语言写成”的断言。笛卡尔强调

“我思”是通达理念的唯一路径：即使感官被欺骗，理智仍能通过数学推理理解物质本质，使理念从形而上学实体转变为科学可验证的对象。

4.2.3. 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真实存在的，而物质世界只是理念的不完美映射。他强调理念的超越性和永恒性，以及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哲学思考可以接近或理解这些超越的理念。但他的理念是抽象的、独立于感官经验之外的。相比之下，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更加注重理性的内在结构和动态生成过程。他认为理性不是一种静态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动态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从具体的观念到抽象概念的转化。斯宾诺莎特别强调了“观念的观念”这一概念，即通过反思和分析具体的观念来达到更高层次的抽象和理解，实现了对柏拉图主义理念论的进一步拓展。

5. 总结

通过对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理念——包括理念论、正义观、认识论和政治哲学的详细阐述，以揭示这些理念如何构成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基石，并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维度来看，柏拉图主义不仅影响了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更在中世纪与基督教神学的融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近代，柏拉图主义对理性的重视也为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理念论、逻辑学和目的论方面的成就对哲学问题进行了拓展和深化。这些贡献不仅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石，更为后来哲学家对知识、真理和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对柏拉图主义对西方哲学历史建构的深入分析，为理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洞见。这种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柏拉图主义的魅力所在——它的理念和方法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依然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价值和意义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丰富发展。

参考文献

- [1] Galindo, F. and Alzate, R. (2022) El axioma de elección en el quehacer matemático contemporáneo. *Aitías, Revista de Estudios Filosóficos del Centro de Estudios Humanísticos de la UANL*, 2, 49-126. <https://doi.org/10.29105/aitas2.3-31>
- [2] Ternullo, C. (2025) Higher-Order Platonism and Multiversism. In: Antos, C., Barton, N. and Venturi, G., Eds., *The Palgrave Companion Philosophy of Set Theory*, Springer, 333-357.
- [3] Panza, M. (2024) Platonism, *De Re*,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al Practice. In: Antos, C., Barton, N. and Venturi, G., Eds., *The Palgrav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et Theory*, Springer, 2307-2335.
- [4] Xue, Q. (2023) Plato'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Assessment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Filosofija. Sociologija*, 34, 290-299. <https://doi.org/10.6001/fil-soc.2023.34.3.9>
- [5] Trizio, E. (2020) Husserl's Timaeus. Plato's Creation Myth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f Metaphysics as the Teleological Science of the World.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20, 77-100. <https://doi.org/10.5840/studphaen2020204>
- [6] Fjelland, R. (2025) The Platonism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Historical Roots and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Foundations of Science*, 30, 251-270.
- [7] Viola, M. (2021) Beyond the Platonic Brai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unction-Structure Mapping. *Synthese*, 199, 2129-2155. <https://doi.org/10.1007/s11229-020-02875-x>
- [8]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267.
- [9] 海德格尔. 现象学与神学[M]//海德格尔选集(下).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762.
- [10] 弗雷德里克·C·科普斯顿. 哲学史第2卷第1部分[M]. 伦敦: 伯恩斯·奥茨与沃什伯恩出版社, 1962: 80.
- [11] 黄颂杰. 正义王国的理想——柏拉图政治哲学评析[J]. 现代哲学, 2005(3): 29-38.